

# 「世紀意識」再思考



## 一 二十一世紀何時開始？

記得在《二十一世紀》雜誌創刊十周年之際，正值新世紀來臨。我十分困惑，不知道人類的新世紀是甚麼樣的。我曾這樣發問：「時間是連續的，但人類對世紀的意識絕不是連續的。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造成社會普遍觀念的巨變，使我們把這一個世紀和上一個世紀區別開來。……那遲早將帶我們進入新世紀的重大事件究竟會是甚麼呢？」<sup>①</sup>當時，我不敢相信談論了多年的新世紀已經來臨，總覺得即將發生的重大事件會改變人類的世紀意識，使我們走進一個和現在不一樣的全新時代。

一年後，「9.11」恐怖襲擊發生；八年之後，全球金融海嘯展現出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危機新形態。這些都可以說是有別於上個世紀的頭等大事了，但是世界並沒有如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所預言的陷於愈演愈烈的文明衝突之中，也沒有如同1929年經濟大危機那樣導致放棄全球市場經濟。換言之，這些重大事件並沒有改變自1990年已形成的普遍觀念。十年以後的今天，在這一與新世紀同名的雜誌創辦二十周年之際，人類社會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之時，我們終於可以說：今日之世紀意識和冷戰結束後形成的普遍觀念幾乎一模一樣。

在此意義上，二十一世紀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已經開始。



劉青峰與金觀濤

迄今為至，新世紀的展開已證明歷史學家所謂「長十九世紀」、「短二十世紀」的判斷是正確的。「長十九世紀」開始於1780年代的法國大革命和從英國啟動的工業革命。這是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經濟的超增長引起第一次全球化的世紀，其終止於1914年現代民族國家之間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多年。而「短二十世紀」始於一戰以後，其本質為革命、戰爭、極權主義興起、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競爭。它結束於1989年，只有七十多年。

把「短二十世紀」和「長十九世紀」區別開來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紀意識」。博蘭尼(Karl Polanyi)曾用對市場社會形成的意識和對貧困意義的揭示標誌十九世紀的到來<sup>②</sup>，如果再加上民族獨立，博蘭尼的概括大致不錯。確實，我們可以把經濟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以及人類在全球高速經濟增長之時對貧窮的發現稱之為「十九世紀意識」。「二十世紀意識」則是建立在否定「十九世紀意識」之上的新觀念，如社會達爾文主義被批判，民族國家(主義)受到懷疑，否定現代核心價值的馬列主義大行其道，革命烏托邦盛行等等。而「二十一世紀意識」又是對「二十世紀意識」的批判和否定。

## 二 「二十一世紀意識」的基礎

今天看來，自從中國文化大革命暴露革命烏托邦的虛妄，革命發生世界性的退潮後，「二十一世紀意識」就開始孕育了。冷戰一結束，歷史學家紛紛宣稱一個時代已經過去。就在柏林牆被拆毀之時，今年剛過世的歷史學家朱特(Tony Judt)決定寫戰後歐洲史。他把戰後的歐洲比喻為鳳凰在戰爭的灰燼中再生。

確實，如果把十九世紀的本質界定為由民族國家組成的現代社會的形成，歐洲本是人類走向現代社會的火車頭；但是二十世紀的歐洲卻被民族國家慘烈戰爭和極權主義所苦。正如1908年威爾斯(Herbert G. Wells)在《戰禍將臨》中所預感的：「發生在歐洲化世界的不是緩慢衰敗——其他各種文明轟轟烈烈地向前發展，歐洲文明卻被炸得粉碎。」而戰後半個世紀則是歐洲在冷戰陰影下吸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力圖擺脫二十世紀觀念系統陰影，展現現代自由世界創造力、恢復昔日繁榮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的教訓是如此深刻，朱特在《戰後歐洲史》(*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的結尾用「來自死者之屋」來形容現代歐洲的歷史記憶，並討論了這種苦難記憶對歐洲戰後現代社會重建至關重要的作用<sup>③</sup>。

事實上，不僅是歐洲，其他社會特別是俄國和中國不也是如此嗎？正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極權主義的苦難和計劃經濟帶來的貧窮，使人類告別一戰後建立的各式各樣新社會有機體，全面重返現代社會組織原則。如前所述，「二十一世紀意識」可以概括為對「二十世紀意識」的批判和否定，它包括「告別革命」、「確立市場經濟無可懷疑的正當性」、「工具理性」和「普世人權」被全世界所有民族接受等等。否定「二十世紀意識」的前提，是對二十世紀教訓的記取，故

「二十一世紀意識」是建立在不遺忘歷史之上的。正因為如此，冷戰結束，人類迎來了第二次全球化的新紀元。亦正因為對二十世紀教訓的記憶尤新，「9.11」恐怖襲擊只帶來局部戰爭，並未引發不同文明之間的全面戰爭，而2008年的金融海嘯亦並未導致放棄全球化和市場經濟。

然而，就在「二十一世紀意識」確立之時，我想問的是：今日建立在批判「二十世紀意識」之上的觀念系統是穩定的嗎？它會向何種方向演變？我認為在種種表象背後，似乎存在着一種令人不安的潛流，它正在侵蝕那作為今日太平盛世的思想基礎。

### 三 新世紀往何處去：為未來畫象

我把歷史的展開視為普遍觀念和社會的互動。二十一世紀如何展開，無疑取決於今日生活對上述「二十一世紀意識」的反作用。表面上看，「二十一世紀意識」堅如磐石，連「9.11」恐怖襲擊和金融海嘯都不能對其發生作用，然而，有一種變化正在侵蝕冷戰結束後形成的「二十一世紀意識」之基礎，我將其概括為太平盛世的常規化對人類思想的影響。或者說，這就是人類對過去世紀苦難的忘卻。正如朱特在展望當代歐洲思想時所說的：「歐洲野蠻的近代史，作為戰後歐洲重建時所努力抵制的黑暗『反面』，早已被歐洲年輕一代遺忘。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這些紀念碑和博物館會蒙上灰塵，被日漸冷落，只會有一些狂熱的愛好者和受難者的親友參觀，正如同今天『西線戰場遺址』的命運一樣。」<sup>④</sup>

近年來的種種迹象表明，無論「二十世紀意識」帶來的苦難多麼刻骨銘心，但對它的反思並沒有成為「二十一世紀意識」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否則，我們不可能理解為何自由主義是如此軟弱。隨着二十世紀盛行的各種觀念被否定，過去難忘的一切正在迅速消逝。今天，人類各民族正在經歷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太平盛世。在新一代人心目中，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革命和社會動蕩都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超越個人目標之上的任何追求都被等同於意識形態鴉片，宏大的歷史不僅是虛妄的，甚至被認為會帶來暴政。這樣，那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競爭對手的自由世界正在被沒有理想的消費社會取代。

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 (Robin G. Collingwood) 認為，人類的歷史記憶是被壓縮儲存在觀念系統之中的<sup>⑤</sup>。如果把觀念系統分解成上層觀念和這些觀念形成的前提兩部分，那麼形成「二十一世紀意識」前提(二十世紀的教訓)的消失帶來的後果無疑十分重大。我們自然可以發問：一旦「二十一世紀意識」形成的前提不再存在，那保存了驚心動魄的二十世紀歷史的當代觀念系統又會變成甚麼呢？

或許，這種蛻變正是當今世界理想和思想大退潮的原因。人所共知，當今我們正面臨一個沒有思想、個人消費至上的世紀。是的，無人有權指責這種基於個人權利之上的自主傾向。但是，當求知和理想在人權價值中缺位時，追求自由的個人也就變成軟弱的縱欲的個人。也許，沒有甚麼比利用波茲曼 (Neil

Postman) 的名著《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的書名來形容這種愈來愈普遍的新人類的精神狀態更為傳神了。波茲曼寫此書的目的是揭示電視和大眾傳媒使人淺薄化，他絕對想不到此書出版後二十多年，「娛樂至死」會成為今日人生的寫照。

早在1980年代，我就把自己界定為一個殘存的理想主義者。雖然我曾以反思和批判意識形態為自己的工作定位，但我從來不認為人可以沒有理想。故我是屬於二十世紀的人，和時髦的當代思潮格格不入。隨着二十世紀的遠去，我們這些上一世紀的遺民一天比一天孤獨。記得1990年代，我尚把一天到晚坐在電腦面前的同事稱為「電腦的配件」，今天我們自己難道也不是如此嗎？在旅行中只要不能上網，就覺得缺少了甚麼。一旦停電，更是世界末日。人與人之間是這樣疏離，但又是那樣離不開社會網絡。當思想不再重要，一開始感到的只是改變社會的無力感，很快就加劇為對時代的失語症，最後這一切轉化為對自己甚至對人類二十世紀歷史深深的懷疑：過去世紀的一切除了提供錯誤教訓之外，究竟還有甚麼意義呢？

#### 四 大歷史視野中的人類社會走向

今天在愈來愈多人心目中，二十世紀已被定位為人類走向現代社會過程中的一個錯誤。到處可以聽到這樣的歷史想像：只要德國不把列寧送回俄國，就不會有十月革命，亦不會有中共的建立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深感這種思想模式的荒唐和有害。

事實上，正因為歷史被視為是偶然的，人類二十世紀苦難的歷史才沒有在理論(性)層面深入扎根，並牢不可破地成為「二十一世紀意識」不可分割的部分。歷史不是必然的並不等於說歷史是偶然的。因此，為了和遺忘鬥爭，為了保障「二十一世紀意識」的健全性，歷史學家有一不可推脫的責任，這就是在否定宏大歷史敘事的潮流中，再一次強調宏觀歷史對人類的重要性。

我曾把十九世紀定位於現代社會雙層次結構形成、市場經濟終於擺脫社會有機體的桎梏超增長的時代。現代社會本是建立在個人權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認同這三大價值之上的，但是在「長十九世紀」，這三大價值存在着甚麼樣的深層聯繫，以及它們在運行中會出現甚麼問題尚不清楚。事實上，正是平等和個人自由之間關係的不清楚，使得經濟危機暴露個人權利清單上的內容並非人人可欲時，才會出現視人權為階級權利的平等烏托邦；亦正是民族國家主權和普世人權關係的曖昧，才會帶來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主權的無約束性，導致幾乎把現代社會毀滅的世界大戰<sup>⑥</sup>。

表面上看，極權主義源於俄羅斯帝國和德意志帝國在一戰中的解體。然而，如果更深入地全面檢討「長十九世紀」的歷史，特別是長期被西方學者忽略的中國傳統社會現代轉型的歷史經驗，我們發現，正是現代社會的缺陷加上傳統社會在

現代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失序，極權主義才會興起。俄國和中國傳統社會在現代轉型中，都是以建立新社會有機體來代替建立在以憲政為基礎的現代契約社會。在某種意義上說，極權主義背後是人類自軸心時代以來心靈中把國家和社會視為道德有機體的幻象。不經歷二十世紀的痛苦，人類是不可能從該幻象中醒過來的。故一直要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暴露了革命烏托邦的虛妄、世界革命退潮、共產主義宣告失敗，人類才有可能重回一戰前的全球化市場社會。

這樣看來，十九、二十、二十一世紀實為現代社會形成不可缺少的邏輯環節。毫無疑問，今天全人類在大框架下是重新回到十九世紀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現代社會雙層次結構。但是，人類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歷史河流，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必定和十九世紀的全球化有所不同，同樣是由民族國家組成的現代社會，十九世紀的全球化結構和今日究竟有甚麼差別呢？有人稱之為多元現代性的呈現<sup>⑦</sup>，有人則將今日世界概括為「風險社會」<sup>⑧</sup>。而我則更願意將其稱為十九世紀確立的現代社會雙層次結構，在經過二十世紀的演化和自我糾錯後的成熟。在此意義上，「二十一世紀意識」實為現代性的全面呈現。而它正在經歷的蛻變，則說明人類歷史正在開始一全新的歷程。或許可以借用湯因比 (Arnold J. Toynbee) 說過的一句話：現代性在考驗中。

### 註釋

① 金觀濤：〈我們生活在「新世紀」嗎？〉，《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10月號，頁44。

② 波蘭尼 (Karl Polanyi) 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頁116、108。

③④ 朱特 (Tony Judt) 著，林驥華等譯：《戰後歐洲史》，下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頁3、741-67；767。

⑤ 何兆武、張文杰：〈譯序：評柯林武德的史學理論〉，載柯林武德 (Robin G. Collingwood) 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21-22。

⑥ 金觀濤：《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26-32。

⑦ 該說法立足於現代世界在終極關懷和文化上的多元，其實現代社會本質上是文化多元的，只是該特點在十九世紀沒有充分表現出來而已。

⑧ 這方面最著名的是貝克 (Ulrich Beck) 的風險社會說。貝克認為，隨着全球暖化、國際恐怖主義盛行和不可預見的金融危機，人類在二十一世紀將面臨「世界風險社會」(Weltrisikogesellschaft)，它是第二次現代性即全球化的產物(貝克 [Ulrich Beck]、格蘭德 [Edgar Grande] 著，章國鋒譯：《世界主義的歐洲：第二次現代性的社會與政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實際上今日人類的風險並不見得比二十世紀更大，就拿剛過去的禽流感而言，上個世紀任何一次患流感死亡的人都比它多。但現在人的恐懼卻比二十世紀的人大得多。它剛流行之時，人們就把它想像為1920年代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流感。因此，當今的世界並不是甚麼風險社會，而是恐懼風險的社會。而這種恐懼正來自於「二十一世紀意識」及其正在發生的蛻變：太平盛世的常規化對普遍觀念的塑造。